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报告



执行摘要

# 避免进入死胡同

中国的经济改革及其全球意义

# 避免进入死胡同

## 中国的经济改革及其全球意义

执行摘要

DANIEL H. ROSEN

2014年10月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报告  
与荣鼎集团共同编制**

## 合作机构



# 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

凭借其顶级的顾问、研究员，以及领先的亚洲专家网络，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为政策开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平台。它以真正的亚洲全范围覆盖、企业和政策领袖平等参与，及其所代表的亚洲协会全球领先的研究能力为傲，致力于促进整个亚洲的繁荣、安全及可持续性。



荣鼎集团将政策经验、定量经济工具和实地研究相结合，分析颠覆性的全球趋势。它致力于为金融、企业、政府和非营利部门的投资管理、战略规划和政策需要提供支持。荣鼎集团在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设有分支机构，在华盛顿、上海和新德里也有合伙人。

---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力图规避对公共政策事务及其所赞助的报告和出版物中所述的其他问题采取机构立场。本报告中所有事实陈述和意见表达均由其作者承担唯一责任，不反映各机构、项目出资方或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理事会和职员观点。

© 2014 The Asia Society. 保留所有权利。

###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

网站：[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http://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

Twitter: @asiapolicy

电子邮箱：[policyinstitute@asiasociety.org](mailto:policyinstitute@asiasociety.org)

#### 纽约

纽约州纽约市公园大道 725 号

邮编：10021

+1 212 288 6400

#### 华盛顿特区

华盛顿特区新罕布什尔大街 1526 号

邮编：20036

+1 202 833 2742

# 前言

**过去三十年来**，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取得了像中国这样的翻天覆地的经济成就。中国现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出口国，累积了巨额贸易顺差、巨量的外汇储备，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决策者、企业高管以及学者们的目光全都聚焦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围绕中国未来发展前景仍然饱含争论。

对中国而言，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通过在 2013 年 11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上公布意义深远的改革运动来应对主要经济增长减速的风险。如果北京转变方向步入所宣布的改革航线，则中国企业、政府机构，以及社会个人的行为将发生巨大变化——并因此为中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创造机会。如果改革计划停止，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无论怎样，中国的新政策设计及其实施的成败将对全球经济及亚洲和其他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如此事关重大，并且结果远非确定，很显然需要明确改革计划包含哪些内容、如何进行，以及它对政策和企业意味着什么。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 (ASPI) 成立于 2014 年上半年，旨在解决有关亚洲未来及其全球角色的关键问题。为进行有效决策，政府及企业领导人必须理解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是如何改变着他们所处的环境。ASPI 不仅仅承担帮助我们的利益相关人应对不确定性的研究，还收集亚洲和美国政策和企业领域的重要数据，以讨论复杂问题，并在可为全亚洲带来繁荣、安全和可持续性的应对措施上展开合作。我们格外关注那些处于政策和企业交汇点及亚洲内部关系中心的问题。

该报告旨在为中国以外的决策者及企业领袖提供其了解、监控并适应中国经济改革计划所需要的视野。它阐述了为什么中国着手实施经济改革，并描述了西方观察家所熟悉的九个政策领域的改革计划。该报告追溯了中国在实施这些改革措施方面的进展，并提出了可用于追踪其未来走向的定量与定性指标。

本项目由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 (ASPI) 和荣鼎集团联袂呈现，双方后续还将就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展开一系列合作项目。本报告的作者 Daniel H. Rosen 通过分析三中全会的经济改革公告、评估改革顺利贯彻完成的可能性，以及估计不同结果对中国经济及全球经济的影响，开拓性地对中国的改革建议和前景指出了方向。他还对中国以外的决策者应如何应对此类改革提出了建议。

我们谨代表亚洲协会感谢 Dan 及其荣鼎集团同仁向本项目奉献他们的远见卓识和非凡的视野及能量。同样，还要感谢 ASPI 团队的几位同仁在这一创举途中所作的奉献和努力：Debra Eisenman 负责支持这项事业的很多实践性环节，Anubhav Gupta 负责协调全球各地的发布会，而 Josh Rosenfield 则负责监督编辑流程。我们还要感谢 Susan Shirk 对早期稿件的宝贵反馈，感谢 Orville Schell 分享他对中国的深刻了解。

在执行本项目时，我们极大地获益于 ASPI 荣誉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的宝贵建议。我们还要感谢亚洲协会联合主席 Henrietta H. Fore 和 Ronnie C. Chan 的持续支持。亚洲协会全球各地中心的主管在帮助本报告覆盖更广的读者群体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最后，我们要向 Jack Wadsworth 致以诚挚的谢意，正是他促使 ASPI 寻求这一成果并给予慷慨援助，才让我们得以承担并完成该研究。

**Josette Sheeran**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亚洲协会

**Marshall M. Bouton**

临时执行董事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

# 执行摘要

**习近平主席**于 2013 年 11 月宣布对中国经济进行全面改革，承诺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按照相同的法律法规公平对待国内和国外投资者，以及改变政府职能。该项改革方案（简称《决定》方案）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它将成为中国现代历史的转折点。其大胆程度也表明，在经历 35 年举世瞩目的经济表现后，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过时，亟需迫切而非渐进式的改变。在评价风险时，习主席援引了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充满激情的政策现代化诉求：避免进入死胡同的唯一方式是在本国和世界范围内深化改革开放。

尽管做出响亮的号召，但种种原因让中国和境外观察对改革采取的形式以及改革举措是否能充分落实产生怀疑。首先，宣布的改革方案有些特立独行，难以以发达经济模式作为衡量基准。其次，正如中国早期改革浪潮一样，2013 年改革方案为试验性举措留出了必要空间，并且未对最终的监管机制做出规定。第三，某些相同的承诺之前提出过，但并未兑现，因此受到分析家的嘲讽。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全面实施所制定的原则（例如，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党对经济的控制被大大转移，超出中国领导人的预期。因此，该项新议程并未引起中国的发展路线在商业和政策预期方面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只是放大了对此的争论。

为了解决这些不确定性，本研究将对中国经济改革方案的内容进行评估，并指出其在第一年的进展情况。我们认为，该方案中经过重新定义的政府职责声明以及有关监管机构改革的九大方面，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监管理念趋同。此外，我们得出结论：中国领导层正在全面推动经济改革，具有目的性和紧迫性，但是速度不尽一致，并需同时解决过去阻碍系统性改革的障碍，以及继续面对目前复杂的实施情况。也就是说，对于克服当今改革障碍至关重要的权力巩固，以后可能会带来问题。

根据现有证据，无法保证现有改革获得成功。在多个改革方面，领导人并没有得到众多精英的共识，并且在方案中保留了冲突信息，这是因为习惯性和必要性。在很多情况下，新的法规和实施指导准则并未得到很好的定义。尽管习主席在《决定》中指出，使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成为核心理念，但是东京、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对这一绝对命令的意义却有着不同的理解，更不用说北京了。领导人的完整意图愿景处在不断变化中，并且北京的当前举动所暗示的市场化推动力是否能够继续保持正常轨道和速度以满足既定的 2020 目标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我们将对迄今为止的行动进行检验，并为辨别偏离轨道的进展提出衡量指标。

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必要的，但不足以开启一个新的经济模式。自该方案发布的一年里，众多改革政策文件已经由党和政府下发，我们将在本报告中对最重要的文件进行分析。随着后续行动证据的逐渐积累，对中国领导人是否有意或有能力改变规则表示怀疑的声音已经平息。根据改革证据、采访和对中国 GDP 增长的分析，我们得出结论，领导人承认旧的增长来源已经枯竭，如果国家希望避免出现危机的话，那么实施大胆举措来构建新模式已经迫在眉睫。为了证实该评估，我们确定了过去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并阐述了它们日渐减弱的的能力，同时对《决定》中规定的应对措施进行分类，并说明了改革实施进展迹象（和倒退与停滞迹象），以及那些能够确认改革承诺是否兑现的经济活动。

我们预计中国的 GDP 增长在 2020 年将达到 6%。该增长的一半来自国家资本的持续投资，但前提是该投资较目前而言需要关注不同资产。另一半可通过更加高效地利用中国有限的人力资源和资本来实现：即经济学家所指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通过效率实现的增长取决于新的规则和制度，即让市场来主导资源配置，将人力、货币和材料等资源分配到实现最快增长的部门。在没有市场化的情况下（这取决于本研究中所描述的监管重塑以及关于党和政府角色的新思维模式），领导人会对所青睐的项目进行大量投资，但却出现逐渐衰减的效果，并且来自生产率的潜在收益都将消失。只通过投资实现的增长意味着会在 2020 年出现硬着陆：GDP 年增长率不会超过 3%。不断下降的生产率很容易拉低私人投资，使 GDP 增长降低至 1%，这必将导致一场危机。

我们使用这三种情景来预测 2020 年的增长潜力，并对监管改革的九大方面进行分析，以便从贸易和资金流的角度来探究中国经济改革的全球意义。据此，我们将基于中国的展望提出有关国外利益的建议。

##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再适用

为 1978 年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很多驱动力已经减弱，而新的增长来源要求实施尚未落实的改革。人口红利推动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实现经济增长，但是目前的劳动力已经达到峰值，并开始缩减。在过去十年中，资本形成为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但是我们发现，随着债务融资规模越来越大，资本的有效使用对于金融从业者变得日益困难。在钢铁、煤炭、房地产等很多产能过剩的行业中，现有投资的回报正在逐渐减少。新的行业渴望投资，但是与前述行业相比，他们资本占用较低，若要获得国有银行的关注，则需要一项平权法案。全要素生产率收益正在不断减少，因为实施世贸组织 (WTO) 要求的最后一轮强势改革所产生的收益已经枯竭。

但是中国的增长潜力并未消耗殆尽。相反，数十年的高质量增长是有可能的——前提是改革。我们有巨大的机会升级制造业以生产出具有更高质量和更多无形

价值的产品。农业现代化有巨大潜力为国家及 1 亿留在农村而不移居到新城市的居民造福。从广告业到医疗保健业再到工程方面的诸多服务行业已经日臻成熟。大量中产阶级渴望在环境治理方面做出投资。这些增长机会依赖于迟来的监管改革，但其实施速度会超过大部分人的预期。

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维度也需要进行改革。贸易在经济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拥有巨大的比较优势来满足全球需求，并且对商品和服务的进口具有大量内需。金融全球化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如果中国与全球储蓄者的金融活动能够自由跨越中国国境的话，那么跨境证券投资将大幅增长。如果狭隘主义得到避免的话，中国的境外直接投资 (FDI) 具有很大潜力。如果中国公司想保持住全球市场份额，并在国内实现能力升级，则对外直接投资至关重要。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中国都将继续依赖于全球自然资源，即使外国的政策环境风云变幻且存在地缘政治担忧。

### 十八届三中全会路线图

国内和国外分析家对习主席及其政府于 2013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对经济做出的重要改革表示怀疑，三中全会是传统上来说发布新经济思想的会议。他们认为，习主席与先辈一样，对改革充满复杂感情，会因改革所面临的潜在抵制而使改革大幅缩水。他们错了：党发布了大胆的经济改革宣言，并且伴随着监管重建，这些都超出大家的预期。其核心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或者简称《决定》）随附了习主席以个人名义作出的解释说明。据此，主席声明了推动经济改革的的意图和权力，而不满足于舆论所给的限速。习主席的方案中规定了 2020 年完成一系列改革的硬性日期。

在最高水平上，《决定》成为现代化治理的宣言。十八届三中全会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非政治问题。但与 1978 年一样，2013 年 11 月召开的全体会议号召全面改革：政治和安全、以及经济领域。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需要改变（中央和地方）政府层面、党和国家、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平衡。在过去十年间，缺乏相应政治改变导致经济改革失败，因此当前的方案更具希望。经修订的政府《职责声明》将成为《决定》中的第一要素，表明经济工作着重八个方面：

- 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 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
- 保障公平竞争
- 加强市场监管
- 维护市场秩序



- 促进可持续发展
- 推动共同繁荣
- 对市场失灵情况进行干预

这些目标在《决定》中，以及要求政府退出非服务于这些目标的活动的相应指示中都有所体现，例如运营竞争性行业的业务、要求不必要的审批、以及阻碍正常的市场重组。简言之，十八届三中全会打算将中国变为更具监管的国家，建立职责明确、强有力的监管机构，以便规范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自然产生的令人利欲熏心的特殊利益。中国新的职责声明与发达经济体的理念基本一致。

《决定》在 16 个特殊方面提出 300 多项举措，令人难以解读。按照主要目的，我们对这些指示进行整理，结果表明，九大监管重点是该方案的核心。

## 中央-地方财政改革

中央-地方关系成为中国财政事务、税收政策争议、资源配置问题以及很多其他发展问题的核心，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发展道路上的真正风向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权力与责任的不平衡已经造成资源的不当分配，以及省级层面对中央改革的阻碍。《决定》承诺解决这个问题，但只是总体而言，而非针对具体情况，这让读者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感到没有把握。但是按照我们对其他大部分监管领域的认识方式，后续行动的证据已经在 2014 年显现，因此可以断定《决定》已成为一个起点，而非一纸空文。最重要的是，2014 年 6 月，共产党领导人批准了深化财政和税收改革的顶级国家计划；规定了改革优先顺序和任务；并且出乎一些人意料地为“基本”完成主要任务设定了 2016 年的中间期限。财政部长楼继伟在财政部的实施计划中详细指出，应强化改革预算管理措施，改善税收体系，并使中央-地方财政体系更加合理，使责任与资源相匹配。中央-地方改革成为共产党领导层所确定的首要工作之一，因为它是很多其他改革领域的基础。

## 竞争政策改革

实施强有力的竞争政策是发达市场经济的标志，它能为竞争者带来最大化的竞争而非赢得特定优先权。《决定》承诺让政府退出大部分传统干预，这自然会增强竞争机制。在中国经济的每个层面上，都存在反对竞争的特殊利益，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改变这种状况。但是，监管人员被要求改变现状，可政府还未建立负责保护正当程序和公平性的机构，这导致该领域的改革工作变得非常困难。实际上，竞争机构采用新工具的方式让国内外很多人感觉具有歧视性，尤其是针对外国公司。这可能是创建有利竞争环境的最佳时间或最糟糕的时间：北京需要证明它是否承诺将正当程序拓展至所有市场竞争者。

## 金融体制改革

金融体制控制帮助中国实现了数十年的增长，但付出的代价是国内效率进步缓慢，消费者正在为此埋单。关键金融变量仍然由政府主导，包括存款利率、获得银行服务与信贷的机会、汇率、股票与债务发行、跨境证券资本流动、以及有关破产资产的诸多决定。政府官员详细阐述了系统改革的重要性，并且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已经采取了大部分措施。《决定》汇总了剩余的大部分工作：授权私人中小银行、重启新股发行上市、完成汇率与利率市场化等等。在实施层面，汇率波动已经放宽，IPO 已经重启（但进程断断续续），并且影子银行已经被冻结，而新的在线银行业务已经获准。一项有中期时间表的保险行业改革计划已经发布。央行 (PBOC) 行长已经表示希望在 2016 年完成存款利率自由化；商务部几乎已完全撤销了对外直接投资监控；并且截止 2014 年末，监管机构希望实施存款保险计划。有些目标可能会推迟，并且 PBOC 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有关货币秩序的措辞，以便进行某些刺激。总体而言，很少有人对正在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提出质疑，但是很多人担心出台措施太慢会使得无法与相关责任进行匹配。

## 外贸与投资改革

中国通过商品贸易、对内直接投资、服务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双向证券投资（投资于股票、债券和其他证券）与世界经济密切相关。在发展初期，中国允许开展外贸和投资，但随着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该目标必然做出了改进。外国合作伙伴希望从中国获得更多互惠，并且《决定》中设定了进一步的贸易和投资改革目标，因为这是中国经济自身利益使然。其还承诺对国内和国外投资实行相同的法律和法规，并将市场力量置于经济中心地位，但特殊情况除外。规则是公平、开放、透明，并有助于为所有公司建立平等的竞争环境。目前的进展各不相同。在公司法及其繁重的注册资本要求方面已有所改变，对三大外商投资法的改革即将开始。上海自由贸易区与其他下一代试行自由贸易区已经推出，但结果不尽如人意。某些跨境投资已经开放。然而，用于解释哪些行业将被禁止市场化的地方负面清单 (negative lists) 尚缺乏进展，并且我们尚未看到国家负面清单出台。更为普遍的是，外商投资企业界乌云密布，甚至有中国支持者认为，不可避免的调整与重塑监管问题正在以不成比例和歧视性的方式转向国外企业。因此，尽管有所进步，但在疑虑中被淡化。

## 国有企业改革

与过去相比，国有企业 (SOE) 和国有控股企业在中国经济中仅占很小一部分，但这些行业在很多方面仍然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国有企业允许北京在项目、行业政策和总需求方面引导经济增长，并且它们将为党和政府带来收入。国外的观

观察家们认为中国对降低这些国有企业的作用并不感兴趣，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的改革者担心国有企业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最后，《决定》要求进行富有成效的国有企业改革，但其中混杂着许多改革倒退或停滞的迹象，这些都应该进行澄清。其目标包括通过引入私人股东来稀释国有控股；从国有企业中提取更多利润为公共支出提供资金；指定哪些行业依法需要国家控制；明确指出当国家在竞争行业中保留非控制股东时，正常的市场竞争应当适用。

考虑到这些公司的权力，《决定》的解读者质疑这些变革是否将会实施或者能够实施。通过审视迄今为止的努力，我们注意到，以习近平为中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已经成功解决了大部分强大国有企业中的顽固性管理问题，增加国有企业红利上缴，削减了行政补偿，并委派审计机构查出腐败和特殊利益交易。2014年8月末，国有资产监督和管理委员会（SASAC）在北京扩大了对央企实施的监管改革，并且20多个省份已经公布了国有企业改革计划，涉及省级国有企业上市或出售最多70%资产等问题。尽管该进程的终点尚不清晰——至少北京明确表示将会对特定公司保留大量股份，但出人意料的变化正在显现，并需要进行仔细跟踪。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成果中，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用于解释政府将继续保留控制权的国家负面清单尚未出台；因此尽管该领域存在其他积极措施，观察家们也必须保留判断。

## 土地政策合理化

在发达经济体中，土地改革问题很少能引起当前决策者的关注。在中国，这是一项与其他因素同样重要的未来增长潜力的来源。若没有土地改革，北京很难实现将城市劳动力储备维持多达3亿常驻新工作者的目标，其中的2亿人已经进入城镇，但不愿放弃他们与农村土地的联系。近些年来，因监管不力造成地方通过土地征用来获得预算的情况已经形成不可持续的财政体系，而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加入了社会抗议的行列。尽管多数国外观察家认为并不存在这种联系，但《决定》最终还是提出了这些问题。它承诺对地方政府约束村民出租或以其他方式利用自身土地的能力所作出的限制进行监管，不强制农民留在农村（当然希望这样做的人仍将获得权利保护），还要向他们提供公平的价格，激励他们将权利转向更加高效的农场经营者，并抓住机会向城镇转移。土地政策改革支持者已习惯这一方面的缓慢进度，并不期待此轮有大规模实施。然而，2014年8月公布的综合土地登记制度令人鼓舞，其在2014、2015和2016年制定了中期时间表，并将在2017年建立一个完整的国家数据库。该制度将有助于改善土地产权和正当程序的基础，并让城镇化激励重回正轨。最后，快速全面的市场化不仅推动家庭收入增长，也因此增加了农民产品收入，这将为农村发展提供最重要的支持，并且土地政策本身在实现过程中将会存在一些限制。

## 劳动力与共享福利

中国的人口红利在共产主义时代刺激了 GDP 增长：从 1982 年到 2013 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5 岁至 64 岁）增加了 3.75 亿人，已经超过 10 亿人，边际增长等于全美劳动力的两倍半。今天，人口红利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并且中国的劳动力规模已经开始面临长期缩减。与此同时，35 年的稳定收入增长和城市吸收多余农村劳动力已经将中国置于转折点，对竞争力和社会稳定具有深远意义。《决定》提出了诸多方面的劳动力和共享福利问题：教育、医疗保健、工人权利、最低工资以及收入不平等。令人鼓舞的是，改善市场活力和创造私营企业工作机会现已被列为重点工作，并且还提出了社会保障的重要性，包括失业保险。户口制度改革将要实施，户口将所有中国居民享有公共服务和福利的权利与家庭地址捆绑在一起，这种制度自 1950 年起就开始限制劳动者的内部迁移，并且对于三分之一的人口来说独生子女政策将会终结。北京还承诺推出一些仍需关注和改善的基本政策：对失业率公开统计，从而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指导意见。

我们认识到关于教育和职业培训、保险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新举措，但迄今为止仍然缺乏必要的行动。真正的创业腾飞证据非常明显——众多新企业开办（主要是私营企业），较 2014 年上半年增加了超过一倍，达到 200 多万家，但是劳动力和共享福利政策需要进行深度调整。

## 环境政策改革

1978 年后，北京对环境污染的宽容态度使其在财务上更容易建立工业经济，吸引那些需要支付环保合规成本的国外公司，并让这些公司通过中国的低成本运营获得超额利润。该态度的消极影响目前正在吞噬着 GDP，更不用说反映生活质量的广泛经济福利指数。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第一项决议的第一句话就提出了中国环境管理改革势在必行。促进可持续发展成为政府八项职能之一，并且这种必要性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税收改革、司法改革和其他众多改革的合理原因。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十分之一专门针对环境问题。该方案承诺在对地方官员升迁的评分中，将环境标准置于 GDP 增长之前，并通过报告向公众曝光排污情况，这是发达经济体中长期使用的方法。

中国的状况在变好之前可能会变得更糟，因为政策变化与环境收益之间存在时间上的滞后，但我们认为在实施方面已取得了重要进步。已经公布了拆除污染工厂的步骤，并且环境保护法已经做出修订，允许非政府组织为公共利益提出诉讼，并且已有数万工业企业的排放情况已经通过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进行了公开披露。在能源方面（最大的排放源），更加系统化地管理煤炭生产的重大举措已付诸实施，并再次关注公共信息登记。中国的环境问题可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

因此人们很容易对变革前景感到悲观。然而，发达国家提供了很多前景乐观的例子，一些不久前环境状况还很糟糕的地方，现已变成具有吸引力的宜居之地。

## 创新政策改革

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是有限的。创新能力是无限的，并构成了高潜力和低潜力经济的真实差异。中国拥有几千年的创新历史，并且中国人为全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现代中国更多的是效仿而非发明，并且近几十年来在中国与外国政府之间就松懈的知识产权保护 (IPR) 问题充斥着紧张气氛。正如环境保护方面，宽松的 IPR 条例可能在前些年推动了中国 GDP 增长，但现在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

《决定》重点强调大力实施市场机制以改善中国的创新能力。它还强调了改进教育文化，以及让公众支持的研发结果得到广泛应用的重要性。文件进一步指出，国防部门与民用创新相结合至关重要，并且中国的公共部门必须对全球人才具备吸引力。在实施方面，为创新人员提供更多的法律支持（包括正当程序和 IPR 保护监管）已经提上日程，但是经过多年承诺之后，需要更具说明性的结果。逐步改变对单一、落后的大学入学考试（高考体制）的依赖已经推出了 2017 年实施细则，但是机械式教学的习惯需要一段时间改变。近期关于国家安全的声明所产生的寒蝉效益非常明显，尤其是在信息技术行业以及人们的在线沟通方面。与很多国家一样，中国在安全与创新潜力之间取得恰当平衡方面还面临着明确挑战。

## 实施是显而易见的吗？

在九大监管方面当中，《决定》所做出的承诺非常重要，至少发现有后续行动初见端倪。在关注实施情况的同时，我们还将考虑改革倒退与停滞的迹象。所有改革方面都出现抵制迹象，意图含糊不清，以及对监管改革的终点持续产生内部争议。我们认识这种中国改革模式：领导者不是采用政治资本来删除政策文件中的词语，而是在对旧条文重新解释以适应需要的同时增加了新条款。例如，中国不再是共产主义，而党仍然保留该标签，而不是改变标签并引起意识形态上的纠纷。因此，我们更加关注新举措，而非旧条文。

中央-地方财政改革和金融制度改革力度很大。已经初步对国有企业改革和环境政策采取了重要措施，但仍然需要确定北京是否会全面实施这些方案。对于竞争政策而言，虽然已经显著提升，但尚未做到公平公正。外贸和投资改革已经得到关注，并且某些元素已经实现自由化（例如对外 FDI 监管），但仍然缺乏明确的方向，其对外贸业务的态度仍然存在冲突。土地、劳动力和创新政策比较难以描述，但是每种领域都表明至少出现了一些新的方向性。

习主席为这些变更设定了时间表，因此我们不需要等待太久便可见证《决定》的意义以及保持乐观的合理性。在重要方面，北京已率先取得进展，甚至设立了

近期的中期时间表，从而踏上实现 2020 年目标的正轨，例如中央-地方财政改革的 2016 年时间表、2015 年开始允许非政府组织提出环境公共利益诉讼，并立即提高中央国有企业的红利上缴率。

如果中国的经济改革对经济流产生预期效果，则可以说明改革的真实性。因此，我们利用可观察的指标，反映各项改革的实施情况。例如，中央-地方财政改革将会增加中央向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与强制性地方支出相比的份额。竞争政策现代化应当会使豁免正常市场规范的行业数量明显减少，包括国有企业。利率自由化将会在正式银行贷款利率和非正式、借款人场外市场利率间的趋同中反映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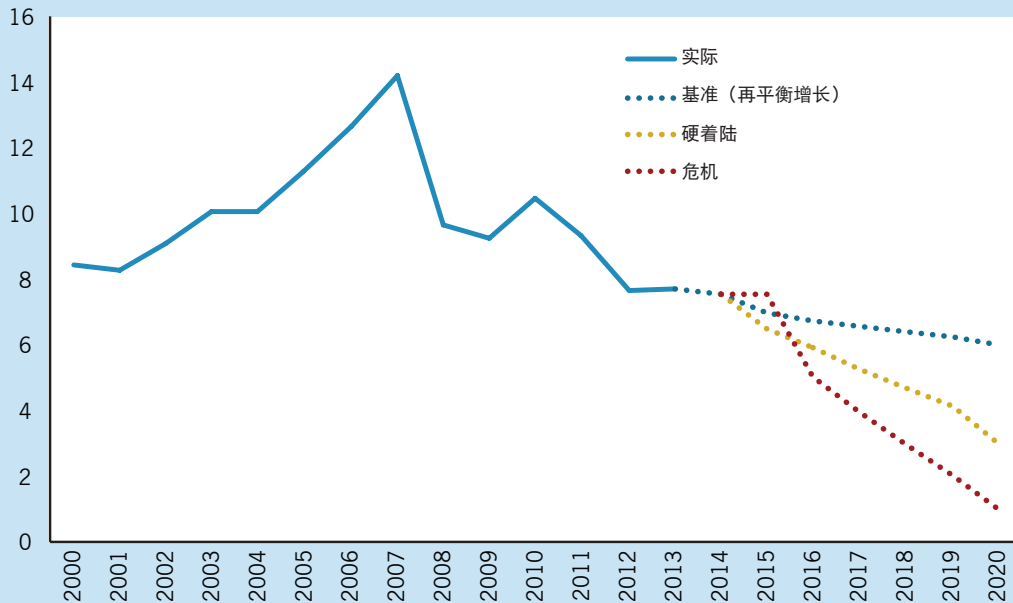
### 国内外影响

根据我们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范围、速度和前景做出的评估，我们将探究改革的国内和国际影响。中国在过去 35 年中做出了很多政策突破，并且已经通过很多方式被国外感知。但是在 1978 年实施改革开放时，中国的 GDP 仅占世界 2%；而今天，已占到全球 GDP 的 15.4%，成为巨大经济体。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在 1978 年几乎为零，并且让其他国家难以触及。到 1989 年，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份额达到 4%，并且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已经达到 11%。在过去三年中，该份额平均达到 28%。与过去经历中等收入政策冲击的国家相比，中国与 world 市场更加相互依赖。中国为改革拟定的时间表很短暂。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当前改革将会对世界经济造成冲击。

根据所承诺的监管调整，我们将采用增长计算框架来探究中国的长期潜在增长，该框架结合了对输入和效率收益的假设。这是对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或者其他因技术变革或政策环境改善而产生的 GDP 收益所做出的盘点。我们在最佳情景下（在 2020 年实现软着陆）得出结论，改革允许对资本进行重新部署，从浪费用途转向高回报行业，因此资本存量和 TFP 改善会使复合 GDP 增长率达 6%。虽然低于过去和当前的增长率，但这依然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如果改革停止，因改革调整所带来的生产率收益将会丧失，并且越来越多的私人资本不一定会继续投资，使得中国在硬着陆情况下最多达到 3% 的增长率，或者在出现危机时最多达到 1%。图 1 展示了这三种推测。

**图 1：中国在改革与不改革两种情况下的 GDP 展望**

GDP 增长（每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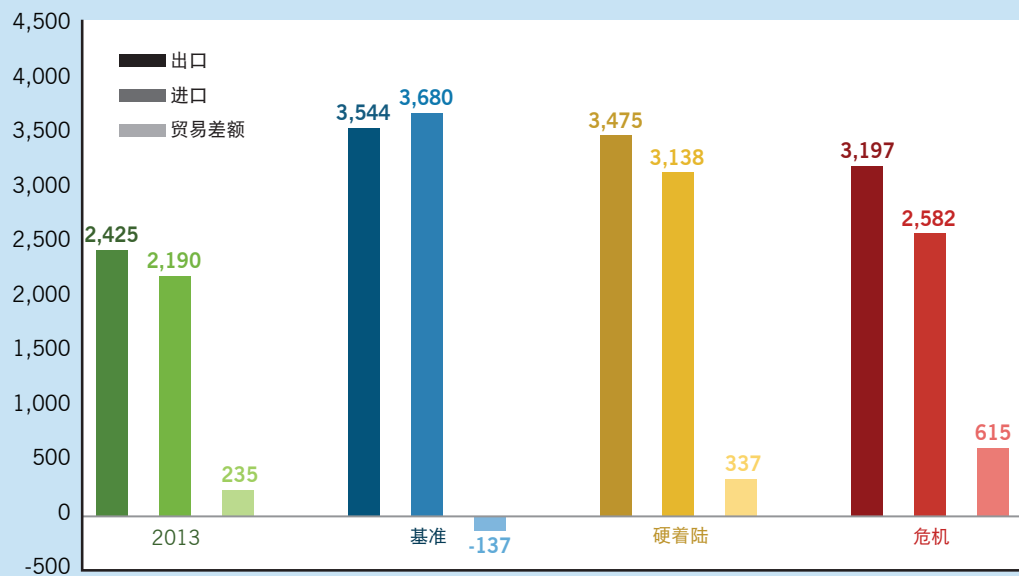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荣鼎集团估计。预测始于 2013 年以后。

不同的增长率累加，风险很高。中国 2020 年的经济规模在改革与不改革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差异将会超过 2 万亿，这个数字是目前俄罗斯的整个经济规模。

我们将这些情景（基准（改革）、硬着陆和危机）与监管改革蓝图联系起来，以帮助我们思考中国在 2020 年与世界的贸易和金融互动。这些预测只是对潜在结果的大致估计，但是对于探究当前改革如何影响中国和海外的未来增长会非常有价值。大幅实施监管改革是我们预测的基准情景：改革固然很困难，但不会难于应对增长跌至 1-3% 的情况。在改革过程中，中国将于 2020 年调整至大致平衡的经常账户，目前经常账户顺差占 GDP 的 2%。这是由于在较好的外部资产组合下实现了 1370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2013 年美元）和 1450 亿美元的净投资收入顺差所产生的：这两者都会逆转当前情况。进口增长快于出口，有助于缓解贸易政策压力，并且中国会因更多的企业直接投资获得更高收益，而不是依靠外汇储备带来的低利率政府债务。在该期限结束时，中国的官方外汇储备将会适当减少，这符合北京阐述的意图。

图 2：2020 年中国在基准情景、硬着陆和危机情景下的贸易概况

2013 十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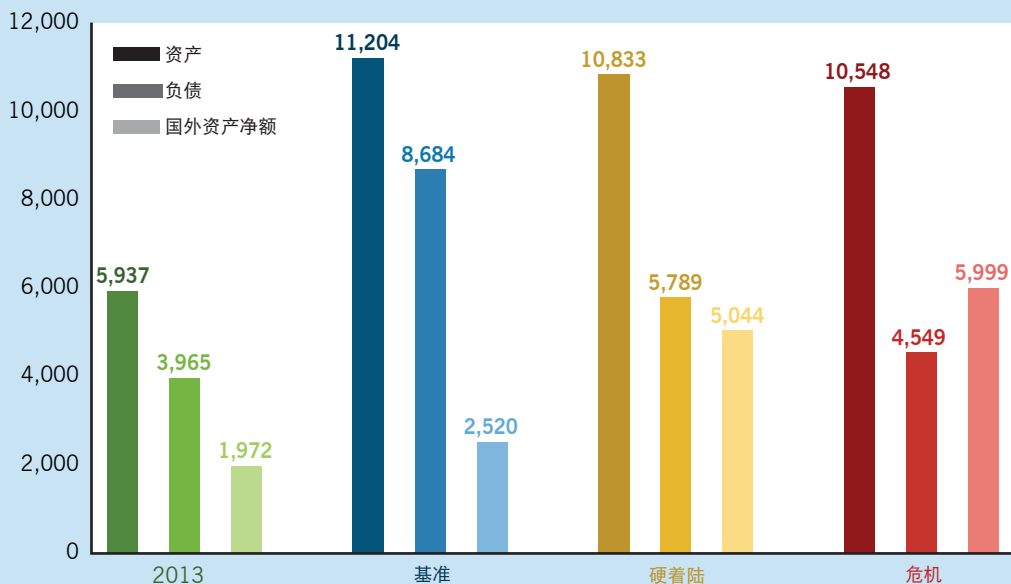
来源：荣鼎集团估计；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

如果改革偏离正轨，则硬着陆和危机情况下会使外国经济与公司出现利益腐蚀。图 2 汇总了与 2013 年起点相比的各种贸易情景。在两种下行情景下，进出口将会下滑；中国的外国商品与服务进口将受到强烈打击。在改革情况下会有贸易逆差的好消息，而在危机情况下，中国将产生超过 5% GDP 的巨大贸易顺差，这是 2005-2008 年出现的水平。

在金融方面，仍然需要做出较大调整，因为跨境财务流动至今已受到很大限制。在改革情况下，中国继续吸引 FDI 不断增加，而对外 FDI 持续增长，到 2020 年将会翻倍，每年达到 1600 亿美元。（这些都是保守估计。）由于金融账户与资本市场自由化，双向证券投资（组合投资）均会出现显著增长，因此到 2020 年，每年将会出现超过 1.1 万亿美元的双向资金流动。根据这些假设，在未来七年内，中国将会有 3.5 万亿美元的资本流入国外股市、债券和其他资产当中，而 2.4 万亿美元的外国储蓄将会流入，以改善中国资本市场。这 3.5 万亿美元的对外投资几乎相当于整个美国股票市场资本的 20%，或 NYSE 欧洲股票市场资本的整体价值。这意味着金融中介机构存在巨大机会，并且中外储蓄者能够使其投资组合多样化以实现健康的投资效果。



**图 3：2020 年中国在基准情景、硬着陆和危机情景下的全球资产与负债**  
2013 十亿美元



来源：荣鼎集团估计；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

中国与世界的金融互动前景会因无法保持改革进程而受到显著影响。图 3 说明了这种差异。在硬着陆情况下，中国 2020 年的外部资产将会增至 10.8 万亿美元，而不是 11.2 万亿美元，负债将会达到 5.8 万亿美元，而非 8.6 万亿美元。这些变化源自较低的 GDP，对内 FDI 下滑，国外投资人逃离和市场开放出现延迟，双向证券投资显著降低，以及更新的资本控制和其他因经常账户盈余而试图吸收外汇储备的措施。在危机情况下，资产增长会变得更慢。除较低的 GDP 外，危机还会触发阻碍各类流入的限制情况，特别是短期投资，并会导致大量资本从灰色渠道外流。通常在危机情况下，这会耗尽外汇储备，但我们假定资金流出不足以抵消不断膨胀的贸易顺差，顺差因国内需求崩溃并遭受全球商品价格下跌而致；因此，我们预计外汇储备到 2020 年将会进一步增加至 5.9 万亿美元。

## 结论

我们完成了对中国改革的探究，并对两个问题做出回应。首先，从我们所累积的事实和推断矩阵中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其次，我们能为外国解读提供什么样的建议，考虑这些结论对他们和他们的经济意味着什么？中国在过去 35 年中的苏醒已

经对全球工作者、消费者、投资人和环境造成深远影响，而当前改革的冲突将会显著增强这种联系。国外的企业和政策领导人势必要理解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

我们得出五个结论。

### 1. 改变游戏规则的改革方案

习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人在2013年11月发布的经济改革方案旨在改变游戏规则，而不仅仅是像往常一样做出少量调整，或拖延时间的尝试。国外对这些发展计划的反应是片面的、不理智的且充满分歧的，而中国观察团仍然抱着等等看的态度。这并不难理解：过去的改革通常不会获得成果，或按照不符合发达市场经济规范所希望的方式实施。新的《决定》在全面改革方面仍然存在模糊的术语或市场化改革倒退与停滞的迹象。然而，根据我们对中国新方案背后的推动力、该方案制定的新激励措施、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后实施的初步情况所进行的分析，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政策形成和经济模型正在发生决定性突破。

新政策轨迹会对国际经济体系产生深远影响，国外官员和企业领导者需要对他们的预期和回应做出相应调整。在理解这些发展计划方面达成稳固的共识会有所帮助，并且我们希望本次研究能够有助于达成这种共识。

### 2. 趋同的经济形势 — 但具有特异性

很显然，北京认为不同的市场经济原则并不适用于中国，这与中王国 (Middle Kingdom) 并没有不同的重力是一个道理。目前中国的政府职能和监管优先事项基本与发达经济体制定的对策一致。目前没有北京共识或其他替代经济理论可用。

但是，这种特性必须符合总体形势。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市场化规则存在很大的政策差异，而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社会和发展挑战、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以及政治挑战，因此可会更有特异性。中国的改革既要与发达经济体趋同，又要保证其独特性，这种矛盾令人不安，考虑到中国可能会在十年左右的时间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如果中国更倾向于干涉主义，其他经济体将面临难题。

### 3. 大量例外情况和倒退与停滞的迹象

一个相关点是，在这样广泛的改革日程下，那么多相互冲突的压力需要管理，中国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在不同领域以不同速度进行调整，甚至改革中的某些例外情况从长期来看是有利于市场的。很多国家因内部政治原因会将某些行业置于正常监管之外，尽管他们与普遍原则相悖，并且这些例外情况会造成相关福利损失。美国在对待墨西哥糖的问题上撇开了自由贸易，这是由于政治原因，而非经济原因。中国将拥有自己的特殊行业；我们只能希望这些行业不会太多。最具发展潜力的早期改革迹象是发布负面清单，解释哪些行业会受到保护而不引入竞争；这更加能够表明北京非常认真地确保市场成为管理经济活动的主导和决定性因素。

#### 4. 非常快速地开始，并转向透明化

中国目前改革和结构性调整的速度已经超过一年前的预期，或者超出大部分人的预期。然而，相关证据（启动后不足一年）只是局部的、传闻性的和存在争议的。2020 年完成目标非常具有野心，对于诸如利率自由化和中央-地方财政改革等基本要素而言，一到两年的较短时间表是非常大胆的。改革包括对外开放（就外贸和投资而言）并非仅仅对内开放，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外部自由化相较于近些年将会加快。然而，如果在较长的时期内部调整速度明显快于外部开放，则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国际经济紧张。例如，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为 2.35 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以合资公司的形式存在，他们可能希望对其重组和买入，正如北京和各个省份希望允许对国有企业所有权结构实行改革一样。允许他们这样做非常重要，而不是让他们坐等第二轮。类似地，改革意味着需要加强执行竞争政策，但《决定》中承诺的针对私营中国企业实现正当程序和公平对待也同样适用于外国投资者。除指定的特殊情况外，现在不应有任何理由认为“私营”不包括“外国私营”企业，这在北京为即将实施的政策所采纳的国民待遇原则中有所体现。

#### 5. 政治调整的真实前景？

很多分析家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只是简单地维持共产党的权威。如果党要持久，则有必要确实实现潜在的经济增长——中国的领导人非常明确地阐明了这一点。但是，习近平的经济方案要求监管机构大量放权给肩负促进竞争任务的下层官员。我们在其中发现了政治演进的四个驱动力。首先，持续的反腐败运动变得非常清晰，通过政治权力滥用利用国家资产和国家监管机构谋取个人利益的现象，在旧的既得利益经济模式中非常普遍。习近平已经决定大规模瓦解腐败的温床，以改变政治状况。其次，改革需要不同的（但不一定是西方的）权力分割以及制约与平衡机制：这些在政策矩阵当中均有体现，而且它们也改变了政治方程。第三，公共信息披露登记正逐渐扩散到政府费用、行政权力、房地产、金融证券、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环境影响和污染排放、就业水平和其他领域。尽管党的上层对“使用阳光作为消毒剂”不感兴趣，但这项透明化运动的政治意义很难逆转，因为公众获悉空气污染数据的实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最后，改革促进 GDP 增长，因此将建立中产阶级队伍。尽管中国的资本家在过去非常保守并且不关心政治，但人均财富和政治预期之间的关系非常强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加速增长也会提升个人针对独裁政治行为寻求保护的预期。

最后，尽管出现了经济自由化的迹象，但党明确表示不会将中国的政治体系与西方趋同。习近平主席已经明确收紧了公民社会的缰绳，创造机会向外界展示中国的利器，并浇灭这样的预期：正当程序将会在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行动可能被视为这一重要阶段抵制改革阻力所必需的，但并不保证党会逆过程，并

在成功调整后重新建立公民自由环境。历史上很难找到单一政党、无反对意见的政治制度能够建立市场主导经济体制的例子。大家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的实施情况表示担忧是合理的，因为经济改革可能会功亏一篑或偏离预期，包括北京的预期。

## 有关外国考虑的政治建议

在本评估中，我们已经尽力避免给出规范性对策，而是坚决尽可能客观地描述 35 年的快速增所带来的经济挑战、改革方案中的政府职能和具体监管方面，以及中国正在按照该方案前行的证据。有关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的不确定性，以及对习近平的强硬领导风格做出的不同解释，都让公众产生等等看的态度。在习近平第 1 年的经济方案中，对新经济思维做出了巨大的先期付出。我们的结论是（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的改革旨在改变游戏规则，以市场为导向，注定会有暂时或长期的妥协，并与超出经济范畴的地理政治战略相关联。鉴于这些考虑，我们为外国观察家提出五点建议：

### 1. 关注改革进步

对中国改革的速度和方向出现不一致的观点，以及对改革是否能够按照预期实施感到困惑，这些都会影响国外政策的形成和实施并转移响应的紧迫性。这种情况对企业和政府是确实存在的。评估改革的工作可能会让决策者不信服或者产生不一致的意见，但它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即使可信度让人难以捉摸。有助于克服这种犹豫态度的积极策略是确定并跟踪能够对改革做出响应的经济指标。习近平主席的《决定》以及随后的实施命令已经要求收集大量最新的经济数据，并及时向公众发布，这对已经被观察到的真实金融经济指标进行了补充。外国官员应当鼓励并欢迎该趋势，因为它将推动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理解。在对中国改革的衡量指标（例如，北京所列出的享受特殊待遇的行业数量）达到充分共识的情况下，将会很容易与中国建立积极的双边或多边经济联系，并非根据当前的局势，而是建立在双方对中国将在三年、五年或七年的发展预期基础之上。

### 2. 表现出对改革的支持

承认中国的改革存在风险，通过增强对共同目标的信心支持改革。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和企业已经克服了中国所面临的许多调整挑战，包括增加运营成本、要求保护政策、反对环境政策实施和其他监管改革，以及政治经济中的无数其他障碍。很多双边和多边能力建设项目已经实施，但某些已经丧失了动力，因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在过去的十年中停滞不前；这些应当重新恢复，或在某些情况下予以替换。发达经济体对改革细节存在不少争论：自从 53 年前该组织出现以来，很多

自由论和中央集权论 OECD 国家已经对正确的政策进行了讨论。支持中国改革要求耐心和自信。在中国，如在美国和欧洲一样，某些人反对市场化，担心不安全或对将物质主义作为社会福利的限制有合理的担忧。这些声音不应总是与反对改革混在一起：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是鼓励传统市场化，同时我们对公共政策目标的认知也在不断发展。

### 3. 关注国内回应

中国的政治和国际安全迹象表明，外界倾向于将中国的改革经济优势看作一种威胁，并通过关注外部权力和影响做出回应。外交政策需要因中国的国内改革而改变，但是如果中国严格执行改革方案，并且应当这样做，那么发达和新兴国家同样需要努力保持竞争力。经过改革调整后，一个更具竞争力的中国将会出现。改革包括政策变化，以反映中国的商业和贸易伙伴的长期要求：金融账户自由化、双向式投资开放、更加公平的内部竞争环境、以及撤销政府的众多经济干预。许多国家总是在比较过去的中国政策，觉得中国需要做些不同的改变，或者他们将在边境开展什么行动来管理与中国融合。展望未来，其他国家针对中国的政策，必须包括建立更好的环境以保持与中国生产率收益相同的速度增长。这要求最高领导层的国家对话，确保在全球环境中开展有效竞争。

### 4. 包括多边因素

尽管竞争始于国内，但在当今的全球经济环境下通常会终止于国外。在很多领域，包括国际直接投资和竞争政策，并无强有力的国际组织和规范来指导行为，随着中国日渐扩大自己在国际系统中的影响力，建立新制度的需求与日俱增。经济体（尤其是现任领导人）应当准备好帮助促进实现这些承诺。当这样做以后，他们应当欢迎中国的参与，而不排挤北京也不会对中国的意见做出让步，并致力于保持对市场经济原则的信心。

### 5. 停止针对北京现行做法的谈判

近些年来，中国的合作伙伴通常会与中国开展双边或多边谈判，以寻求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一系列政策改革。《决定》中关于国内改革的陈述告诉我们，北京认为这些改革是出于自身国家利益，无论有任何外国诉求都必须要实现改革。利用不论如何都需实施的改革来进行谈判并争取外国让步对中国是有利的。这些让步对中国的合作伙伴是有益的，例如减少他们在中国开展贸易和投资的障碍；此外，国际谈判的逻辑对双方的改革者都非常重要，以便让改革得到不太愿意接受改变的同胞的认可。然而，务必要认识到，中国正出于简单的自身利益原因追求市场化经济改革，这是一个明智之举。

## 作者简介

**DANIEL H. ROSEN** 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 2014 年秋季 Jack Wadsworth Fellow 项目参与者，也是荣鼎集团的共同创办人和中国实践领导者。Rosen 先生与多个专注于国际经济学的美国智囊团有联系。他还兼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2000 年到 2001 年期间，Rosen 担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际经济政策高级顾问，在中国入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Rosen 自 1992 年起开始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及其全球意义，已著有或合著有九本主要书籍和报告以及一套短篇出版物。这些资料为政策与商务专家和专业学者所熟知。Rosen 先生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成员，还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会任职。

### 作者致谢

2013 年年中，在 Jack Wadsworth 协助策划的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研究过程中，Jack Wadsworth 邀请我针对当今经济研究员所面临的关于中国的最重要问题给予评估并草拟一份文件。除了许多范围较窄的课题外，我提出进行一项有重要价值的广泛评估，即中国的新一届领导人是否有机会认识到，如果不尽快改变经济模式，近期经济必然衰退。Jack 立刻支持这项最难而棘手的任务。Jack 不仅促使该研究启动，还推动了研究的顺利完成，所以首先要感谢 Jack。

这项课题由荣鼎集团的许多人一起协同合作。Anna Snyder 作为研究助理，负责在研究中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共 21500 字）中的数百项承诺分类，收集在随后几个月有所作为或不作为的证据，以及创建用于预计后续影响的电子数据表。包括 Cassie Gao、Beibei Bao 和荣鼎高级研究总监 Thilo Hanemann 在内的其他荣鼎集团研究员均做出了重要贡献。Trevor Houser 提供了能源与气候方面的重要信息。Zheng Zhu 协助了编制过程。

向亚洲协会的众多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尤其是奋战在第一线的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临时执行理事 Marshall Bouton 及其团队。Marshall 具备多年与中国往来的经验和高效研究的素质，这对研究十分宝贵。Josh Rosenfield 拥有超凡智慧和管理技能，并能够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为该研究进行急需的修订。我特别感谢他的贡献。Debra Eisenman 全程指导该项目。Anubhav Gupta 在组织外展活动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当然，如果没有 Josette Sheeran 对亚洲协会的英明领导，及其同事（包括 Tom Nagorski 和 Christine Davies）的鼓励和管理，这项研究将无法完成。

许多支持者和读者对该研究的草稿和部分内容提供了重要的反馈意见。Barry Naughton、Susan Shirk、Scott Rozelle 和 Claire Reade 都仔细阅览了早期手稿并提出建议，令文字内容大大改善。其他学者和专家帮助解决了具体的不确定因素。他们包括 Menzie Chinn、Donald Clarke、Zha Daojiong、Erin Ennis、David Fagan、Gary Hufbauer、Jamie Horsley、Jacob Kirkegaard、Jeff Schott、John Garnaut、Keith Maskus、Mark Cohen、Mark Duval、Evan Greenberg、Matt Ferchen、Nick Lardy、James O'Connell、J. Michael Evans、Markus Rodlauer、Lestor Ross、Susan Finder、Wei Tan、Xiaobo Lu、Wu Jingchao 和 Yao Yang。Stephen Green 对中国的金融制度演进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在多个关键时刻都是相当重要的意见参谋者。许多官方身份的老朋友和老同事提供了重要建议，但希望在此保持匿名。

对于在中国经济发展方面有共同爱好的优秀个人，感谢他们提供的建议、支持和友情。由于时间紧迫，该项工作难免存在不足之处，当然，我应单独对此承担责任。

特别感谢我的妻子 Anna 以及女儿 Annabelle 和 Josephine。

最后，谨将本报告献给从 2001 年起每年跟我一起参加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新市场”研讨会的研究生们。本次研究的许多想法都是在这些讨论会上提炼而出。他们为更好地了解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带来无限启发，并希望它能够取得可持续的和平发展。

关于本报告详情，请访问 [AsiaSociety.org/ChinaEconomy](http://AsiaSociety.org/ChinaEconomy)

## 其他亚洲协会政策和商业报告

High Tech: The Next Wave of Chinese Investment in America  
(《高科技：中国对美投资的下一波浪潮》)

Sustaining Myanmar's Transition: Ten Critical Challenges  
(《缅甸转变持续中：十大挑战》)

Chinese Direct Investment in California (《中国对加利福尼亚州的直接投资》)

Delivering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The Case of China  
(《实现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案例》)

Advancing Myanmar's Transition: A Way Forward for U.S. Policy  
(《推进缅甸转轨：美国政策之路》)

An American Open Door? Maximizing the Benefits of 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敞开美国大门？让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利益最大化》)

Pakistan 2020: A Vision for Building a Better Future  
(《巴基斯坦 2020：创造美好未来的愿景》)

Current Realities and Future Possibilities in Burma/Myanmar: Options for U.S. Policy  
(《缅甸现状和未来：美国政策选择》)

North Korea Inside Out: The Case for Economic Engagement  
(《透视朝鲜：经济合作的理由》)



让亚洲和美国为共同的未来做好准备

亚洲协会是全球领先的泛亚组织，致力于加强亚洲和美国人民、领导人和机构之间的关系并促进相互了解。

我们致力于增进了解和加强对话，鼓励创造性的表达，并激发跨政治、商业、教育、艺术和文化领域的新想法。亚洲协会成立于1956年，是无党派的非营利机构，在香港、休斯顿、洛杉矶、马尼拉、孟买、纽约、旧金山、首尔、上海、悉尼和华盛顿特区设有分支机构。